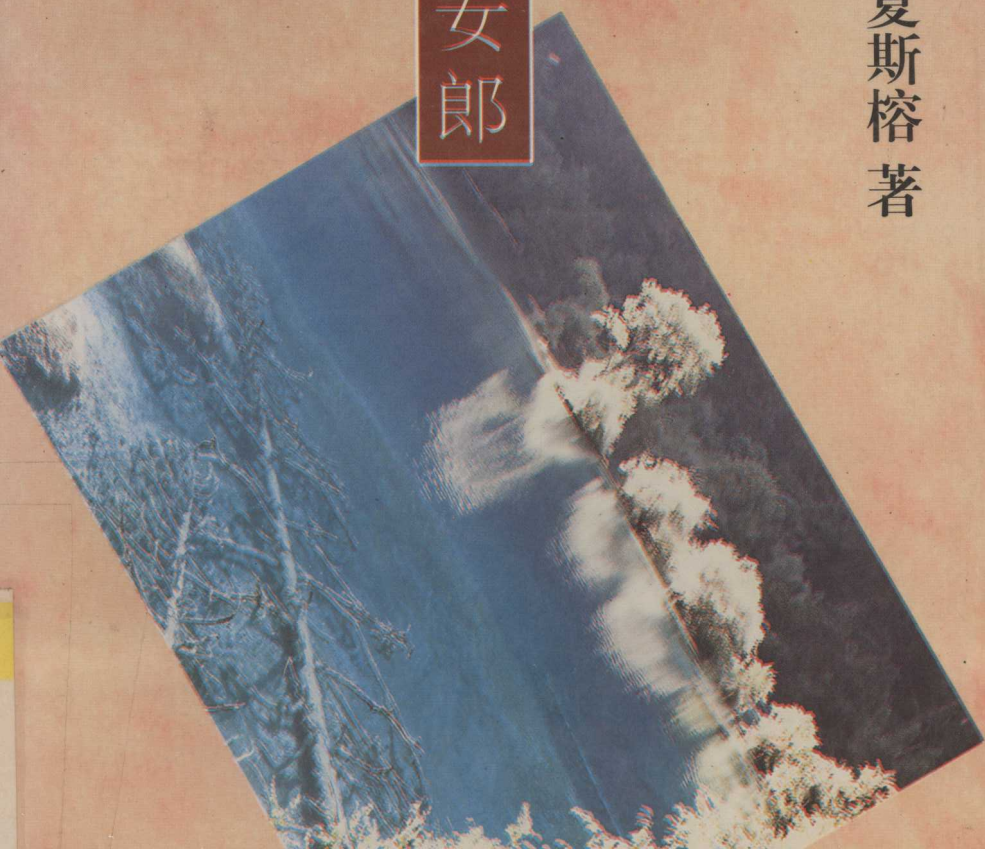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大系

冯艺·主编

持灯女郎

(壮族)黄夏斯榕 著



持灯女郎

黄夏斯榕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持灯女郎

黄夏斯榕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大板彩印厂印刷

850×1168 1/3 9.2 印张 19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63-3245-9/I·850 定价:12 元



读几本好书，交几个知音，写几篇好文章，
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

苏夏斯树

面对二十一世纪

——总 序

●冯 艺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基本上是一个着重革命和对抗的世纪,仅仅在世纪末才出现了全球性的对话和着重经济发展的势头,而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着重经济发展和竞赛的世纪。世纪之交,意味着这两种不同的世界潮流的消长交替。各国各行都在调整自己的位置,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自然也在寻求自己的位置。而要完成这种寻求或调整,就必须用心灵去感受和审视近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状。

是的,少数民族文学曾有过《玛纳斯》、《格萨尔》、《阿诗玛》、《嘎达梅林》、《刘三姐》等不但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也是珍品的辉煌。而今,又有在世纪之交中既深刻于本民族、又怀抱于中华、凝视于世界的张承志,他献身于民族文学的彻底,正是媚俗化和疏离现实的困惑中一团熊熊燃烧的圣火,他呼唤和构造的信仰的中国,将永远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界通向信仰的其中一面精神旗帜。我们知道,现代化建设,表层上是经济行为,而本质上是文化行为,其最终目的是完善人格结构。于是,张承志的

坚信,甚至悲壮,便显得惊心动魄了。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骄傲。

于是,我日益感到世纪之交中对中国文学作出贡献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需要展示自己创作实绩的迫切,而且必须系列化。于是,我们选取的是一批带着本民族生活历史的独特色彩跨进了文坛,并以自己作品的鲜明民族特色及个人风格而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的各民族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而且新老结合,而且是他们在当代文坛的浮躁中身心精研的新作。

审视这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也许能在一定层面上深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批当代作家文学相对于民间文学、古代书面文学、甚至新时期前期文学,都更注重文化内涵和本民族的生命底蕴,尤为注重世纪之交的时代精神。它们多是扎根于本土民族文化土壤生长的,既超越时代和本民族,更是对时代和本民族思索的作品。自然,在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某些新突破或个性中,也存在深刻性和艺术性生命的不同程度,而且,它们也与当前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一样,也出现某种困境和危局的迹象。因而,本丛书本身既是对世纪之交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系列展示和审视反省,也是一种呼吁社会对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给予更多的关注,更是对少数民族作家正视自我正视现实的一种提醒。

同时,这套丛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处于世界性文学交流时代的一个标志。任何一位作家,惟有在与他民族文学的交流之中,既对于他民族文学的借鉴和对于本民族文学的继承,才能实现对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扬弃、继承和发展,才可能成为独创性的民族作家,才可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文学天才。因而,我们群体地对各民族作家的巡礼和系列化展示,便是诚望他们能与各民族的互融相汇中,再以群体的辉煌参与二十一世纪的文化竞赛,不断地揭示着“少数民族文学”所意味的一切。从而,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就谈不上各民族文学

的共同发展繁荣,也就谈不上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

近十年,我日益感知到自己的生命与少数民族文化深深结缘。尤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我始终怀有深刻的敬仰和迷恋,企望自己对各少数民族文学有某种本质的认识,并渴望深入它们,从而获得视野、参照和判断的余地。策划和出版这套丛书,算是我作为一个民族出版社社长、壮族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面对二十一世纪所作出的一种生命的努力吧。

1994 年冬

序

·罗传洲

在一个临近岁末的晚上，我突然接到黄夏斯榕的电话。她说近期要出一个小说集，我忙祝贺她，但她并没有显出过多的欣喜，而是十分真诚地说：折腾了多年的文学，倒是应该有个总结与回顾，这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吧……我知道，面对这个世界，黄夏斯榕并不是一个幸运者，这个集子势必凝聚着她人生的许多风雨和心血。因而，我从话筒传来的话语中听出了一种庄重与人生的况味。接着，我问这个集子叫什么书名。她说叫《持灯女郎》。暮然间，我立即想起了当年经我手发表的那部中篇小说《持灯女郎》的内容，想起了持灯女郎——南丁·格尔的精神，想起了许多篇收进这个集子中的作品，想起了黄夏斯榕这些年来在文学道路上百折不挠的追求……我甚至觉得，她就是一名真正的持灯女郎，无论生命的旅途如何坎坷曲折，都护擎着文学这盏明灯，照亮和温暖了别人与自己的心灵。

这集子的名字取得好。我对她发表意见的时候，胸臆间感受着一种崇高的诗意。

认真算起来，我认识黄夏斯榕也有十四、五年了。起初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那时，她已在南宁市一家医院工作，经人介绍她拿稿件找到了我家里。稿件质量不错，发表了就成了作品。后来，曾为她稿件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相互写信争论过，现在想起来好像是关于妇女问题的。我当时的感觉她是一名在思想上较有见地，性格很执著的作者。由此，我也了解到她的经历：属“老三届”，学医从医，曾在农村矿山基层医疗单位中艰苦工作了十几年。特定的时代背景及社会氛围，使这一代人在经受磨

难的时候也引发了他们对社会、人生更深入的认识与思考,也更容易激发起他们对社会、人民的责任感,并锻造出坚韧的性格。黄夏斯榕无疑当属此列。因而,她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现实精神,以身同感受的体验唤起创作的激情,揭示与关怀人的生存境遇、价值与精神状态,尤其是对于女性。如中篇小说《持灯女郎》、短篇小说《金银花》、《玉佩裤带》等,无不以真切的生活细节、鲜明的时代背景,深刻地展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女性的命运遭际与精神特征,甚具认识意义;而其中的一些女性形象,特别是含有悲剧色彩的女性形象,由于其隐含着思想内涵上的可思可嚼性,也让读者在审美中增添新的魅力。这些作品中,《金银花》就曾获广西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黄夏斯榕自己说过:女人写女人,表达女性关怀是她的创作方向,是她证明自己生存的一种方式。无疑,这种生存的方式正因以上的文学良知及责任感而显出生命的价值。

文学,是一个异常艰辛的事业。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不能在文学之路上前行的。十多年来,为了文学,黄夏斯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牺牲了大部分的休息、娱乐时间等等都是小事,仅就因搞文学创作不被理解而失去最为女人珍贵的爱情、家庭这条来说,并不是每个女性所承受得了的。至今,单身女人的种种艰辛,外出采访发生车祸而落下的脑震荡后遗症等,依然缠绕着她折磨着她。当然,承认及面对这些现实是需要勇气的,但能不屈服不放弃更需要信念与理性的力量的。我想,当黄夏斯榕秉笔写作的时候,她一定会从中领悟到文学于人类精神关怀的责任与热情,并从中获取了抚慰及力量与魅力,使自身的生存方式进入新的境界。

今天,处在即将百年一遇的世纪交迭的历史时刻,《持灯女郎》小说集的面世,充分说明了黄夏斯榕是一位虔诚的文学守望者。在此,我们应该真诚地向她祝福:在新的世纪中有更丰硕的收获!

1997年岁末

《废井》：并非风流轶事的故事

· 黄绍清 ·

翻开《广西文学》1996年第七期的目录，小说栏里有《废井》（黄夏斯榕著），二字令人注目。我的思绪突然跨过遥远的时空，联想的羽翼不由自主地飞向贾平凹。北国曾经有过繁嚣一时的《废都》，如今南疆却出现一个《废井》。都有一个“废”字，难道两者有什么内在联系？好奇心促使我一口气拜读完了《废井》，掩卷沉思，两者的内容毫无共通之处。《废都》就是《废都》，《废井》就是《废井》。但在构思艺术上，两者都是以“废”字为焦点，“废”字中间饱含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沧桑。这种有一定深度的思想倾向是从作品所描述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在此，姑且撇开《废都》不谈，只说《废井》吧！是的，《废井》以一对男女殉情的故事开篇，又以“在废井里发现了阿贵的尸体”为结笔，表面上似乎讲述的是男欢女爱悲剧。但实质上它并非是风流轶事的故事。作品至少在如下几方面表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匠心、审美意蕴和价值取向。

巧合性的载体 必然性的文本

俗语云：无巧不成书，小说创作尤其如此，《废井》当然亦如此。我说的“巧”是作者构思的技巧。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发生在壮乡矿山《废井》里的故事，也因为“巧”而显得有传奇性，富有神秘色彩。不然，对这个“大跃进”时期开掘出来而无用之井，为什么人们却既害怕它又喜欢谈论它呢？那是因为这个“无煤”的废井曾经有过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传说”当年有一男一女“光着身子，脸贴脸地交合着死去，人们无论怎样掰都掰不开”（这当然仅仅是人们的“传说”而已）。而今，无独有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又发生主人公阿贵在此轻生的故事，阿贵服毒自杀而去，他的故事当然没有“传说”那样神奇精彩。但他的死确确实实发生在人们眼皮下，是现实生活给人们提供的意想不到的故事，因而“令全矿哗然”，这就值得读者深思了。

那么，阿贵为什么要自杀？他的死难道是偶然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阿贵窝囊的生存状态谈起。他本来是从瑶山的石头缝里“天生天养”出来英气勃勃的后生，后来到壮族聚居的丘陵地带的壮族人家作上门仔，和壮族姑娘阿姣结为夫妻。再后来，阿姣因有初中毕业文凭被招为矿上的“正式工”，阿贵因只有小学文凭而只能当个“轮换工”（即临时工）。这使阿贵顿时产生矮老婆一截之感，心里颇不平衡。阿姣在煤矿恶劣的条件下，声音“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她牵头成立“三八采煤队”，并且当了队长，还创造了“百天无事故”“百天产百吨煤”的好成绩，成为

矿上的红人；而且每天下班回来命阿贵打热水给她洗澡。这使阿贵感到这女人愈来愈张狂了。特别是听到工友们的取笑议论：阿姣好厉害，“统治你还不够”，还来“统治我们的老婆”；阿贵没本事，连老婆都“留不住”，晚上搂着被子睡觉；阿贵“嫩得似一只小公鸡，怕压不住阿姣这只母老虎”，等等。这使他心理进一步失衡，深感“阿贵白叫阿贵了，一点也不贵嘛！”进而十分后悔自己当了“老婆奴”。

十九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雨果在他的《笑面人》中曾经这样说过：“最可怕的刑罚莫过于受人嘲讽。”“嘲笑的力量就是把嘲笑的对象杀死。人们的笑声有时是能够竭尽力量来杀人的。”这些寓意深刻的经验之谈和哲思妙语不是也可以用来观照阿贵彼时彼地微妙的心理奥秘和精神世界吗？从后来的悲剧结局看，人们的冷嘲热讽加剧了阿贵的自卑自暴自弃的心态，以阿贵来说无异于无形的杀手。这是阿贵心理活动的“全部过去和现在发展的结果”（苏，谢切诺夫语）给读者深邃的启示。

阿贵屡遭阿姣冷落，觉得自己活得太窝囊，不愿看到强过男人的女人。这时，柔情十足的阿盈进入了他的梦寐以求的视线，让他日以继夜地单相思：以至鬼使神差到黑古隆洞的废井中寻觅阿盈的芳泽，在幻觉中被她鳞光闪烁的胴体弄得意乱情迷，神魂颠倒。当轰隆的炮响把他震醒而回到现实的时候，他发现阿盈已经未婚先孕，肚子里的孽种居然是大头卢的，心里充满醋意，怨恨交加；进而也想“把这女人干了”，但却遭到她的严声拒绝。从人物性格的发展看，阿贵追求阿盈，寄托了他对婚姻爱情的理想，而现在连想做一次“真正男人”的这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怎不使他伤心至极，精神世界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小说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巧妙收笔，阿贵自杀的外因、内因，不都昭然于世了吗？

然而，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阿贵的自杀难道仅仅是他个人命

运的悲剧吗？不！他的不幸的命运还告诉人们，这是——

历史性的遗物 落后性的象征

废井是那个特定的年代的产物，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遗物。作者把这个历史性的遗物当作演义人物悲剧命运的载体和舞台，这样人物的性格才能顺理成章的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发展。也只有这样，作者才能“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的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别林斯基）。这样的“个别”的人物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形象和性格的内核寄寓着深刻的落后性的象征。

就是说，在废井里自杀的阿贵不仅是一个“特殊世界”的典型的人物，而且是社会生活中某些落后东西的本质的象征物。我所说的“本质的象征”，指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夫权思想。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封建道德横行几千年，男尊女卑可谓由来已久。在新的社会里，特别是新时期，这种封建思想曾经受到过猛烈的冲击，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逐渐变为可能。但在一些男人的心目中，女人毕竟不能成为强人，只能是男人的贤妻和儿女的良母。如作品中的阿贵，他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择偶标准，思想行动上还孜孜以求。但当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并不懂得重新审视自己，不是想办法与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拉近距离，以求得生存与发展，而是固执己见，坚守“阵地”。结果，他不能征服比他强的妻子阿姣，又得不到阿盈的理想的爱，只能走进自我毁灭的深渊。这种自卑自贱，自暴自弃的心态，是封建的夫权思想走上另一个极端的变态形式而已。作者通过描述阿贵的命运悲剧无

情地鞭挞了男权主义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说明我们的文学创作仍然需要批判现实主义的武器。也就是说,这种落后思想严重束缚了男性的头脑和手脚,使他们裹足不前、同时也成为女性解放的绊脚石,如果不搬开这类绊脚石,就谈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解放!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文学是“一幅图画和一面镜子”,“是一种异常巧妙的批评,是醒世教谕的文献。”《废井》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虽然还没有达到陀氏所说的那种高度,但它蕴含的一定的“醒世教谕”的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它是——

“唤醒社会的警钟 招返迷羊的圣箴”

郭沫若先生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谈到文学的社会作用指出,“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圣箴,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见《沫若文集》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07—108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废井》是有一定的“警钟”作用和“圣箴”的价值取向的。

这种作用和价值不仅在于作品对于阻碍社会进步的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否定,而且通过原生态的真实描述,反映现代生活与传统观念、伦理道德相碰撞,使人们的生存状态显得紧迫、尴尬、无奈;如果不跳出此等怪圈,最后将自我淘汰,自取灭亡,酿成人生悲剧。当然,有悲剧总比没有剧好。因为有剧,生活中的冲突矛盾就

会显露出来,让人们认识矛盾、想办法解决矛盾;即使栽了筋斗,头破血流,也可以领略一番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这样,像阿贵这类现实生活中的“迷羊”才不至于浑浑噩噩、自怨自艾;才有可能迷途知返,重塑自我,走向新生。这也许正是作者创作《废井》主旨所在,因为它显示了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有人认为,揭露这种悲剧没有新意,不必要,女性解放已是老话题。其实,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在各行各业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女性的同时,离婚率也大幅度上升的同时,鞭鞑这种男性自卑自暴自弃的心态,呼唤要让女性得到真正意义上完全彻底的解放,必须先解放男性,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废井》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我这么写也不是说《废井》已经是一篇无缺的“完文”。阿贵之死虽属必然,但在情节的发展上缺乏巧妙的伏笔,还是令人产生过于突兀之感。阿姣作为一个女强人,作为阿贵的妻子,其形象和性格似乎太过于阳刚和雄性化了;如果她阳刚中又满含阴柔,也许会更令人感动。我总感到阿姣这个人物阳刚有余,阴柔不足,未能刻画出其女性独具的美质。女性事业上的成功,是不是一定以削弱女性的温柔美,加强其雄性的色彩为代价呢?

1997.1.24

于桂林

芸芸众生相 惓惓民族情

——壮族女作家黄夏斯榕小说人物形象刍议

壮族 黄绍清 陈丽琴

在生机勃勃茁壮成长的壮族当代作家队伍中，女作家微乎其微，屈指可数；从事小说创作的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夏斯榕一系列的小说作品之后，深为壮族当代文学的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而高兴！

道路坎坷 跋涉艰难

黄夏斯榕祖籍广西扶绥县，地地道道的壮族血统女儿身。她出生于桂林，长大于南宁，青年时求学于广西梧州卫校。18岁卫校毕业后先后到武鸣乡村、县办矿山和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从事医务工作达20年之久。后改行，曾在市人民政府和市委宣传部任职，现在广西某报副刊部做编辑、记者。

她出身贫寒。父亲是个孤儿，童年生活苦楚无书读，靠自学练就一手好书法，但怀才不遇，解放后以拉木板车维持生计。母亲性格争强好胜，胸怀坦荡，因敢于直言被打成右派，运动一来就在劫难逃。父母多舛的命运，使黄夏斯榕从小就倍受歧视和白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跟父母拉板车，拾烟头，卖红薯，挑泥巴，打石头，在社会的底层与苦难的劳动人民同呼吸，尝尽人生的辛酸苦辣。卫校毕业分配，到农村后看到更加贫穷更加落后更加愚昧的一面，社会现实强烈地触动她敏感的神经。她开始思考个人与整个民族、社会的命运，思考人生的真谛和价值。回顾自己走过的经

历：和农民“三同”；在矿山工人中滚打；与知识分子共命运；在党政机关工作，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各类型人物，尤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了解较深刻，从而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节奏的加速，时代发展的要求，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①”于是，她抛弃职称和高薪，弃医从文，拿起笔杆，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爱所憎。

为了搞好创作，提高写作水平，她在繁忙的工作与家务之余上电大，攻读中文课程；读新闻，以求能适应新的工作；对一个当时已为人妻为人母的中年女人来说，其艰辛之程度可想而知。

自1984年在《红豆》发表处女作《淡蓝色的闪光》之后，她相继在《民族文学》、《广西文学》、《三月三》、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其中发表于《民族文学》的短篇《金银花》获广西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通读她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她始终把艺术的镜头对准民族的芸芸众生，审视普通劳动人民的多舛命运和复杂心理，既展示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也抒写他们的理想追求。这其中，当然也有她本人坎坷道路和艰难跋涉的实际人生的投影。唯其如此，作品才显示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某些本质问题的深刻思考，表达出一种接近成熟的理性，使作品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及鲜明的民族特征。

钟情女性 群芳缤纷

从题材的选择和表现的主题来看，黄夏斯榕的小说创作与她坎坷的人生经历、生活际遇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把她的创作历程分成前期后期的话，那么其创作思路转变的轨迹是相当明显的。